

第一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实

○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法租界的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里

○李大钊与陈独秀南北呼应，相约建党 ○魏经斯基身负秘密使命，以记者身分来到中国 ○各地党小组的成立 ○马林尚在旅途，已引起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关注 ○陈独秀、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一大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程子卿突然闯入会场 ○陈公博中途离会，继续他的蜜月旅行 ○烟雨濛濛中的嘉兴南湖，中共一大闭幕

公元1921年7月23日晚8点。

中国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楼房的底层，十几个人正围坐在一张长条餐桌四周，表情严

肃 听着有人发言。桌上，一个玻璃花瓶、一套茶具和一对紫铜烟灰缸熠熠地反射着有些昏黄的灯光，给屋里平添了几分庄重。许多年后，当历史的镜头重新拉回到这里定格的时候，人们不由地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围坐在这里的人们，可曾想到这一幕会永久地载入中国乃至人类的史册？

或许他们真的不曾想到。因为在事过之后，他们谁也记不起这一天的确切日期了。但是有一点相信他们都很清楚：这一天开始的这个小小规模的集会，肯定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一件大事，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天晚上在一张餐桌旁开始的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它的导火索则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废弃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归还日本在大战期间抢占的原德国在山东的种种特权等合理要求，却被美、英、法等国操纵的会议无理拒绝。会议并且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这一决定将明文载入“凡尔赛和约”。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全国上下顿时义愤填膺，群情激昂。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大学生聚集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强烈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愤怒的学生来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将当时躲在曹家的章

宗祥痛打了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学生们的举动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极大震动，他们派出军警逮捕了 30 多名学生。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学生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一时间，各地各界人士纷纷起而响应，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6 月 5 日以后，工人开始加入到运动行列中来。上海工人首先举行罢工，出现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局面，给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南京、天津、济南、武汉、唐山、杭州、宁波、扬州、安庆、南昌、厦门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罢工罢市的斗争，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浪潮。五四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

各地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妥协。5 月 7 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6 月 10 日，下达准免曹、陆、章职务的命令。6 月 28 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达到了。这场历时 50 多天的反帝爱国运动以胜利而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表现与以往相比具有了许多鲜明的新特点，在罢工中工人没有提出任何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只是从反帝爱国出发，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惩办卖国贼。尤其是在斗争中，上海工人开始打破帮口、行会和地域观念等狭隘意识，实行了跨行业、跨地区的同盟罢工，而且在罢工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召开工人领袖联席会议问题。上海 18 个行业的工人代表曾发表联合宣言，提出“全国工界取一致行动，内部组织完固，庶可对外”。这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强大威力，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由自在阶级逐步转变为自为阶级，工人运动也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从单一行动发展到联合行动，开始摆脱了追随资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斗争的被动地位，以独立的社会力量和主人翁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热潮。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两年多时间，史称“五四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思想界空前活跃。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北洋政府卖国求荣的黑暗统治，感到难以容忍，深恶痛绝。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促使改造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所掀起的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力图开创一个新社会，一种新生活。于是，各种思潮竞相登场，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呈现出一派新旧交替、相互渗透的复杂景象。最终，马克思主义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而成为社会新思潮的主流。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贡献最大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原名耆年，字守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他曾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苏俄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一直热情颂扬社会主义，不间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李大钊把《新青年》六卷五号编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三个部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起了开创的作用。同一时期，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关怀和帮助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马克思生平介绍和著作摘译，从1919年5月5日一直办到11月11日，前后历时六个多月。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曾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重点章节，并在按语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

工联合 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在此前后,《新青年》以及其它一些进步刊物,也都从不同角度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初只是在知识界的范围内进行,有较大的局限性。五四运动之后,革命知识分子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现代的中国革命离不开工人阶级的力量,只凭知识分子的活动是不能改造中国的。只有实现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的结合,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从此,不少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扬“劳工神圣”的观点,决心“与劳工为伍”,在工人中进行了大量切实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陈独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他曾四次赴日求学。辛亥革命前后,他组织社团,创办报纸,致力于开发民智、鼓吹反帝爱国的活动。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翌年3月改名《新青年》。《新青年》自创刊之日起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表现出坚决彻底的反封建的精神,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在主编《新青年》的历程中,陈独秀也逐渐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化为共产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他不仅发表大量的文章从舆论上给予支持和宣传,而且亲自起草了矛头直接指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并与李大钊等人亲自到繁华场所散发。1919年6月11日,在“新世界”游乐园散发传单的陈独秀被反动警探逮捕。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组织下,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声援营救陈独秀出狱的高潮。慑于舆论压力,98天后,京师警察厅将陈独秀“具结”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陈独秀,并没有像在“具结”手续中“保证”的那样接受所谓的“豫戒”条件,他设法巧妙地避开当局耳目,在1920

年上旬，应湖北学生联合会和湖北各界联合会的邀请，前往武汉讲学。他在武汉大谈中国存亡与改造社会等问题，受到各界热烈的欢迎。当地报纸对此作了详细报导。湖北政府大为惊慌，急令陈独秀停止演讲，速离武汉。北京军阀政府也派军警在陈独秀住所等候，准备在他回北京时加以逮捕。李大钊等人获悉上述情况后，设法将陈独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中暂避。几日后，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去天津，然后由天津乘船前往上海。他们二人化装成下乡讨帐的商人，雇了一辆骡车，抄小路先到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家中停留，再转到天津。在几天的旅途中，他们交换了在中国建党的意见，并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这一事件 史称“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李大钊返京后 和邓中夏、高陈北 鄧 6 7 0 T d (,) T j 4 .

议。会上决定 5 月 1 日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推选陈独秀、阳松为大会顾问。上海工界的联合行动，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极大惊慌。他们出动军警，百般阻挠，使原定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纪念大会被迫几次改换会址。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终于使大会胜利召开。大会结束后，7 个团体发表了《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努力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和平的人类世界 决定和你们同力合作 负担这个责任”¹⁰，更希望你们“你们的指导”。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对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向往，表达了他们寻求解放、改造社会的愿望。

《新青年》杂志在这年的五一也专门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各类文章 20 多篇。这期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重要文章《五一运动史》，详细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产生经过和各国工人阶级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而斗争的事迹，并表示了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殷切希望。专号还发表了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 运用劳动创造一切 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说明了中国工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为了有组织地持续向中国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上海的革命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专门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周刊。1920 年 8 月 15 日首期《劳动界》出版。这个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 开辟了演说、时事、调查、通讯、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等专栏，深入浅出地向工人传播革命道理 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劳动界》还充分发挥指导工人斗争的组织作用，不断登载国内外劳动界的现状，特别是工人阶级反抗和罢工的消息，曾连续报道了上海、南昌、苏州、无锡、杭州、广州、九江、唐山等地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教训 也报道了英、法、美、德、意等国工人罢工的消息 激励

广大工人团结起来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劳动界》周刊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和支持，成为党和工人联系的桥梁。上海的成功尝试为各地提供了借鉴，不久各地也相继创办了工人刊物。广州于同年 10 月 3 日创办了《劳动者》，北京于 11 月 7 日创办了《劳动音》。

2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先进的革命分子更加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赞颂苏俄的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在中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这个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1919 年 3 月，在列宁的主持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和统一。次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列宁在会上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的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国际“二大”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步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同时要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为取得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这一革命，还必须援助反对封建主义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民族与殖民地的纲领，科学地指明了民族解

放运动的方向，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俄共党员魏经斯基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赴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魏经斯基等人此次来华的公开名义是筹办“俄华通讯社”和担任俄文《生活报》记者。

魏经斯基一行先到达北京，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政策和苏俄的对外政策，使李大钊等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苏俄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更加坚定了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决心。他们一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讨论建党问题，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介绍魏经斯基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联系。

1920年5月，魏经斯基一行到达上海，首先会见了陈独秀，并同《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杂志的编辑或主编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张东荪、戴季陶等进行座谈。魏经斯基与陈独秀多次就中国革命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否则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陈独秀首先在上海开展了建党活动。

上海的建党活动是以讨论社会主义的方式开始的。他们以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为中心，经常组织座谈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参加这些讨论的成员还有来自沈玄庐和李汉俊等组织的星期评论社和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陈独秀、

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李震瀛、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戴季陶、张东荪等人，是座谈讨论会上的常客。魏经斯基以很大的兴趣参加了这些讨论，并不时发表自己的意见。随着讨论的深入，陈独秀等人认为，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没有组织，光做文章，决不能推动革命。于是提出了建立共产党问题。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也正是多数人的想法。他们一致感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张东荪参加过一次酝酿建党的座谈会就退出了，并且很快暴露了他的假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戴季陶最初还表示同意，但真要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时，他借口不能同孙中山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即声明退出了。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活动不久也退出了。留下来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则坚定不移，决心依据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所提出的建党原则，在中国组织共产党。

1920年8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陈公培和施存统先后出国留学，陈独秀又继续与李汉俊、俞秀松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并相继吸收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加入组织。当时他们还起草了一个党章草案。

不久，上海党组织又陆续吸收了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赵世炎、林伯渠、周佛海、刘伯垂等参加。但他们参加时间很短，就离开上海了。如周佛海、施存统到了日本，陈公培、赵世炎到了法国，刘伯垂到了武汉等等。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了当地党的组织的发起人。

上海共产党组织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在筹备建党的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建立，都与上海有直

接的联系，有的则是上海党员到外地去帮助创建的。在酝酿筹备党组织的过程中，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尤其是上海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即要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陈独秀则在南方直接指导了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建党工作。

在上海创建共产党的同时，李大钊也在北京加紧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工人运动，广泛联络先进分子，积极为北京建党作准备。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主义者团结一批进步青年主持了北京纪念五一节的活动。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主持召开了纪念会。他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演说，称赞苏俄十月革命以后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强调要把“五一节当作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邓中夏等专程赶到长辛店，对那里举行纪念大会的1000多名工人讲了话。李大钊在《新青年》出版的“劳动纪念号”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的重要文章，详细介绍了“五一劳动节”斗争的历史，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觉悟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高君宇也在专号上发表了《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提出“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共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的主张。北京这次空前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起了促进作用。

这期间，李大钊还对天津等外地的进步青年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影响。1920年8月，周恩来等20位觉悟社成员来到北京，与在京的少年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茶话会。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在会上发了言。李大钊提议各团体有标明社会主义之必要。他

认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不足以团结一致，对外尤不足以与人联合行动。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合一个“改造联合”并制定了宣言和约章，促进各进步团体的协调和统

9月，张申府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应当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并希望李大钊在北京加速建立共产党的组织。9月下旬，张申府回到北京，把和陈独秀会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他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10月初，张国焘也从南洋参加全国学联募捐回到北京，于是，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

张申府于同年11月到法国里昂大学任教，北京党组织就只剩李大钊和张国焘。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标榜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无政府主义者先后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随后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党组织扩大后，以自认公议的方式对当前的各项工作作了分工。李大钊主持全面工作，并从个人薪俸中每月捐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张国焘负责工运，刘仁静、罗章龙负责青年团，黄凌霜和陈德荣负责创办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

事隔不久，北京党小组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严重分歧。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分工和党内纪律。这与马克思主义要求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是有害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要一切政府。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共事。经过一番争议，没有获得一致的认识，结果无政府主义者都退出了组织，

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由罗章龙等人接办。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以后，北京党组织将一批优秀的青年团员转为党员。1921年1月党组织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将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并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这之后又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21年7月为止，北京支部党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李骏、张太雷、陈为人等人。

北京党组织不仅与北方各地的建党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首先建立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建党后的一年间，他们先后派张太雷去天津、唐树彝去唐山、高君宇去太原、邓中夏去保定、陈为人去济南，李大钊还亲自去郑州，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和促进北方各地的建党工作。1921年春，北京党组织委派张太雷去伊尔库茨克，参加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工作，并于同年6月和7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由此可见，北京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与上海相类似，在建党中起了重要作用。

武汉的建党活动是由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人发起的。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要他们组织起来，领导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同年秋，李汉俊还亲自来武汉，与董必武等商谈建党。与此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与其他共产主义者共同筹建武汉共产党。

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武汉共产党组织。会议首先传阅刘伯垂由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并研究了支部建立后的活动。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担任支部书记，大家表示同意，为了避人耳目，决

定租用在湖北警察厅背后的一座房子作为党的机关，门口挂起“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作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

到 1921 年 7 月以前，武汉支部的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赵子俊、刘子通、黄负生等。

长沙的建党活动是在军阀横行、反动派猖獗的政治环境下进行，因而是以极隐蔽的方式开展的。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是长沙共产党组织的发起者。

毛泽东曾为赴法勤工俭学和驱张（敬尧）运动，两次来到北京。1919 年 12 月，为了扩大湖南驱张运动的声势，争取全国人民的声援，毛泽东等 40 人组成的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期间，毛泽东与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有了进一步接触，参加了他们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军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1920 年 1 月，由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期间，毛泽东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使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1920 年 4 月，毛泽东由北京到达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三个月，多次会见了陈独秀，与陈讨论了《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131 页）这一年的夏天，毛泽东由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 年 7 月，毛泽东回到长沙。这个时期，上海、北京正处于筹备建党的关键阶段，而毛泽东又在这个关键时刻与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了直接的频繁的联系，这对他本人以及长沙建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开展革命斗争，首先要切实组织起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新思潮

的普及推动革命活动。于是他着手与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创办了文化书社。文化书社以销售进步书籍和刊物为主，销售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新青年》等。文化书社得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和在武汉的恽代英等人的支持 并与全国 60 多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省内外影响很大。

长沙建党前后，文化书社实际上是毛泽东、何叔衡等人进行内外联络的秘密机关。

1920 年 8 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又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研究会会务。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肖旭东、蔡和森、李维汉以及在国内的罗章龙、邓中夏等有着频繁的通信联系，彼此交换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道路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多次直接谈到建党问题。1920 年 8 月 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明确提出在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 才有神经中枢。”并说中国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在 9 月 16 日写的一封长信中，蔡和森又一次明确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 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 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 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 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 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

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1月，毛泽东复函蔡和森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为‘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

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聚集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这次会议也讨论了关于建党的问题。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召开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和肖旭东、蔡和森、李维汉的来信，并提出五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供大家讨论：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在讨论中，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他主张过激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接着毛泽东发言，他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劳工主义，用阶级专政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彭璜、陈子博等人也赞成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这次大会还提出了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熊瑾玎发言认为现在“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彭璜也主张立即建党，陈子博还建议在乡村与城市都要组织党。

就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后不久，陈独秀、李达曾致函毛泽东，请他在湖南长沙建立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并先后寄来《劳动界》、《共产党》杂志和上海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经过精心筹备和严格物色，第一批先找来六位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宣告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到1921年7月前后，长沙党组织的成员有毛

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夏曦、肖铮、彭平之等人。

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开展了建党活动。1919年冬，王尽美、邓恩铭和育英中学教师王翔千等发起组织了“励新学会”，并创办《励新》半月刊，由王尽美任编辑。励新学会是传播新思潮、团结进步青年的群众性团体。开始参加这个学会的进步师生约15人，后来发展到50余人。不久，励新学会开始分化，一部分成员倾向三民主义，参加了国民党；一部分信奉无政府主义；还有一部分则信仰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励新学会活动期间，王尽美、邓恩铭就和北京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联系。王尽美多次去北京，向李大钊请教在山东如何开展革命运动和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等问题。邓恩铭曾代表山东的学生界到北京、天津参观学习，也接触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由北京前往上海的时候，曾途径济南。由于翻译杨明斋是山东人，于是在济南作了短暂的停留，与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商谈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

1920年9月，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参加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贾石亭、李祚周、赵震寰、王志坚等人。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六十人。当时会员都发有瓷质马克思像的圆形小徽章，凭会章可到会址去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介绍苏俄情况的书刊。这个学会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经验为主，直接为建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随后，济南各校纷纷组织了共产主义学会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活动过程中，王尽美、邓恩铭考察和团结了一批信仰坚定、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革命者，并形成了一个核心。这时北京党组织已经成立，李大钊派陈为人到